

## 中文版序

我很高興為郭偉全博士所譯《傳教士的詛咒》中文版寫序。從我最初拜訪並開始研究洞兒溝村開始，距今已經二十多年了。這個村莊位於《夢醒子》中劉大鵬的家鄉赤橋村南邊幾英里。作為歐洲人的我，初次拜訪洞兒溝時，就深深著迷於華北鄉村文化與我所熟知的基督教習俗的混合。開始查閱洞兒溝的相關歷史後，我就想著寫一本適合英語世界公眾閱讀的書。我想他們應該會感興趣，說不定會驚訝於中國內陸的一個偏遠村莊與其外更大的世界，竟有長達三百年的互動。希望讀者們會喜歡我在每一章開頭所舉出的故事，它們都是我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從洞兒溝村民那裏聽來的。但在寫作者的身份之外，我主要是一個學者，致力於促進相關研究領域的討論，隨著我對這個村莊的歷史加深了解，我也有更多心得亟於同研究中國宗教的其他學者分享。最後我寫就的這本書，實際上是以他們為目標讀者。

然而，畢竟所有作者都無從預知一本書出版後將得到讀者怎樣的評價，哪個方面會最受重視；過去幾年來，《傳教士的詛咒》漸漸得到更多關注，被視為體現了一種新的史學潮流：將微觀歷史學的方法與全球史整合。實際上，這一取徑向來是我的興趣所在，貫穿了《夢醒子》、《傳教士的詛咒》和我的新書《口譯的危險》

(詳見下文)——它們某種意義上可以算作我探討山西歷史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三部曲。

本書英文版於2013年出版後，最初幾篇評論均出自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者之手(譯者郭博士本人也是研究歐洲宗教史出身)；他們認為，本書旗幟鮮明地反對以往在「文化適應」的主題下研究中國基督教的通行做法。他們注意到，多年來有大量研究從根本上旨在回答：中國和基督教是否能兩全？如他們所指出的，回應這一問題的不少作品非常出色，但立論往往基於對「某種形態的基督教究竟算不算完全中式的」一類問題的先入之見。《傳教士的詛咒》則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基督教和中國認同都不是僵化之物，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本土化與全球化始終處於張力之中，絕非某種不可逆轉的邁向本土化的單向過程。幾位評論者認為這是一種全新的方法論，可用於考察其他的觀念、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只宗教，還可以延伸到政治領域。此外，評論認為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對教會經濟狀況的關注(對神學更感興趣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及以之解釋19世紀中期歐洲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之間的權勢轉移。其中一位行家正確地指出，多數時候發生在洞兒溝村的事情，遠遠無法代表中國其他地方的情況。這一點我也越來越深有感觸：就我所知，以民族志和檔案為基礎對中國其他地區的天主教和新教群體展開研究，大有可為。

在我著手寫作此書時，全球化已如火如荼地展開，可以為全球化的起源提供解釋的全球史研究也因此蔚然成風。不管在研究還是教學中，全球史挑戰了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和方法論。然而，專注於全球很自然就會傾向宏大敘事和鳥瞰視角，所以也有不少爭論質疑如何把個人與地方囊括進來，如何令全球史更易於把握。同時，不管在中國還是整個世界，大量歷史文獻數字化，更容易引入新的歷史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國家和檔案庫追溯某個

人的生平。當然，這在為歷史學者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也帶來了問題：在過去，歷史學者可能經年累月深耕一套檔案，現在的人只要線上搜索某個名稱或術語，即可在眾多檔案中找到一大堆相關記錄，但不可能對每條記錄的地方和文本語境有同樣深入的了解。這是今日歷史學者面臨的主要問題。牛津大學近代早期中東史學者格布理亞爾 (John Paul Ghobrial) 新近建議了一種應對方式：從微觀史的角度觀看整個世界。<sup>1</sup> 梅歐金 (Eugenio Menegon) 和我一樣研究中國天主教會史，也需要處理龐大的檔案資料和跨文化的地域範圍，自然也對上述問題非常關切；他提出應當結合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開創一種新的微觀全球史。<sup>2</sup> 上述學者將《傳教士的詛咒》作為一個範例，認為它展示了如何得以將全球史和地方史寫作相結合。當然，每個歷史學家都可以從自己的研究興趣和風格出發，在這方面有所推進。

《傳教士的詛咒》之後，我又接著去寫李自標的故事：此人是中國天主教教士，乾嘉年間任職於晉東南地區。在為寫作本書查閱檔案時，我在梵蒂岡檔案中發現了李自標的書信，本來想把他寫到這本書裏，然而並沒有證據顯示他曾到過洞兒溝。很快我又發現他早年曾在乾隆朝廷為首個來華英國使團擔任翻譯，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故事，很難在此書中用一兩章說清楚。於是，順著他的信，我開展了一項新課題：探討李自標的一生，與他對照的是另一個最早一批學中文且擔任翻譯的英國人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我的新書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1；暫譯《口譯的危險：兩位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翻譯的非凡人生》) 更進一步，用微觀史學方法分析捲入經典國際關係史中的重大事件的人物生平，試圖對清代中西關係的傳統敘事圖景做出調整。

在這一點上，還有其他許多方向可以嘗試。我希望這本書對新一代的中國研究者可以有所啟發。要想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學語言、對檔案做細緻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會深化、甚至轉變我們對中國歷史以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歷史的理解。

讓我對郭博士在翻譯《傳教士的詛咒》一書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表示感謝。最後的成品優美、流暢，本身就稱得上是一部學術成果。天主教會史涉及大量專業術語，令這本書翻譯起來殊為不易。好在郭博士專業扎實，甚至對不太常見的近代早期意大利教會體制也不乏了解，因此能理解本書所要傳達的想法，並向中文讀者解釋清楚。他的翻譯工作耗時多年，核對了所有中文引文，並且指出了原書中的一些錯誤。史實是否準確對一部歷史學著作來說再重要不過，這部中譯已經訂正了這些錯誤，使之較英文原書更為精確，相信會讓中文讀者受益。

我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最大的用心和專注將本書帶給中文世界的讀者。若沒有他們高度專業的工作，中文版是無法面世的。

沈艾娣

2021年3月